

【故人往事】

鲍青文社： 老济南曾活跃的文学论坛

□岳淑茗



田遨



鲍青文社获奖证书



楚宗坤在鲍青文社里所写文章

鲍青文社，全称鲍青山馆文社，大约创办于民国二十年(1931年)，是由当时济南东部历城县文化名人筹资创办的，辐射方圆百余里，自愿参加的一个文学团体，其组织形式类似于今天的文学论坛。鲍青文社开办期间曾盛极一时，只可惜因抗战停办，其存在时间只有五六年头。

鲍青文社之名源于鲍山。鲍山是济南历城县境内一座小山，附近是春秋时代齐国大夫鲍叔牙的食邑，名叫“鲍城”。曾巩有“云中一点鲍山青”的诗句，鲍青文社的名字正是来源于此。

鲍青文社社址在鲍山东麓的韩仓李振唐家，有时亦在圣人殿(旧址在原韩仓小学)活动。李振唐，字桐藩，行三，优廩生，民国年间历城知名乡贤，时与历城名士谢瀛震被称为“东北乡两位大先生”。他还是一名私塾先生，在自家大院里举办私塾，教授十几名学生。在李振唐60多岁时，还曾给时任山东教育厅厅长何思源(1928年—1942年任职)做了三年家庭教师。何思源离开济南时，把位于洪字廨街的住所送给李振唐冲抵三年教师工资。李振唐的隶书名噪一时，其书法和撰文多用“鲍左山人”号。李振唐为乡里办了不少实事。他主持捐资修建了韩仓宏济桥，后来又在韩仓十字街西北建了圣人殿，殿内供奉孔子，后作为义塾，建国后原址改为韩仓小学。

历城名士谢瀛震先生和他的父亲也是“鲍青文社”的重要出资倡办者。其子，历城著名学者田遨先生，十五六岁时就参与过鲍青文社的活动。据他回忆，他那时曾见过“赀簿”。簿上第一名就写着他祖父的名字和捐款数目：“谢笃训捐银洋贰佰元。”那时，民间不信任纸币，只流通银元、铜元。至于，共赀多少，他记不得了，因为那时都是小孩，不太理会这些，估计有一千元至数千元。资金集中由李桐藩管理，可放债生息，供文社所用。

文社定期会请科举有功名头衔的人士出题，如谢瀛震(岁贡亦称岁进士)、宋按远(举人)、张幼坪(举人)、李桐藩(廩生)、李芙宸(岁贡)等。据田遨先生回忆，模糊记得的考试题目有“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论”、“古今变法成败论”(似是针对清末康梁变法出的题目)、“方望溪书史可法探狱叩见左光斗事《读后感》”等。有时题目出得

非常与时俱进，当蒋介石提出“新生活运动”的口号时，就出过一篇“谈新生活运动”的题目。为此，田遨还闹了笑话，因为那时对时政消息了解甚少，不明白“新生活运动”为何物，只是望文生义，误认为是说大自然与动物的关系，据此写了一篇文章。

当时参与文社的写作队伍最多时能达到七八十人，以年轻人为主，来自附近各个村庄的私塾。1937年以前农村教育的主要形式是私塾与学校并存，有些村子小，受条件所限还办不成学校，孩子上学就以私塾为主，教师一人，学生少则几人多则十余人，课程主要是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易经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》等，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国学了。另外还有书法，主要是以

楷书为主。

家住董家镇东折腰村的楚宗坤(1897—1957)，字顺卿，在周边四五个村都设馆教学，是远近闻名的私塾先生。他的书法造诣也相当高，主要以正楷为主。那时他经常把写好的文章拿到鲍青山馆文社去，通过写作，借以检验写作水平，从而得到不断提高。

韩仓胥家村的刘圣文(号郁周)先生曾就读于李振唐的私塾，他小时候也参加过鲍青文社，回忆起来，记得每月要做一次试卷。阅卷老师正是出题的那五六个人，其实他们也是文社的发起人。他们都是济南的文化名流，都有科举功名头衔，常常在一起聚会，自然就会想到需要成立一个文人学士交流学术思想，展现他们才华论著的平台，同时发现下一辈人中的可塑之才。于是，鲍青

文社在这种情形下应运而生。文社成立之初，制定了严格的组织程序。比如，文社成立后，他们每年都会为文社的事情聚会一次，就当年文社的工作安排交流一下意见。其中，最重要的就是严格阅卷程序和章程。阅卷程序是严格按照前清考秀才、举人的八股考试的方法来执行的，考卷上的考生信息都是密封的。

尽管主审常换，可夺冠冠军却几乎锁定一人，说起来也是鲍青文社的一段佳话，那就是田遨先生。田遨(1918—2016)，原名谢庚会、谢天璇，出身于书香门第，父亲是前清进士，由于家学渊源，从小对诗词书画广泛涉猎。曾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诗词研究院副院长，台北故宫书画院名誉院长等。当年在鲍青文社的考试中，田遨屡夺桂冠，他的考卷被带到周边各村私塾传抄，每次卷子还上都带有阅卷老师对文章的评语，因此，他的少年才名一时被乡野所熟知。

文社成立以后，雇一人专做交通员，负责送试题，送答卷、送奖品等。为方便工作，还给交通员配备了自行车。每次开考之时，他骑车穿梭于各乡各村传送考题，几天后再一一收回，送到济南交给阅卷老师。等老师审阅以后，他再把阅卷后的结果带回鲍青文社张榜公布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有一样十分重要的工作，就是要把当期评选出的优秀试卷带到各村，以供学子们传抄学习。那个时代受条件制约，传抄起来非常慢，交通员就采用灵活的方式，先把它放到一个地点，让学子们有足够的时间传抄学习，等他再来这个地点办其他事一起带走。交通员工作繁忙，各种事情等他去做，包括最后评定后的奖品，也是靠他传送到分散在各乡村的获奖人手中。这里顺便提一句，答卷审阅后，评定出甲乙，答卷一、二、三名有奖品，奖品是纸、笔、墨三种。

田遨先生晚年时，曾这样评价鲍青文社，认为它对乡土文化是有促进作用的，虽也有过笑话、闹剧。写作者都是年轻人，既不搞土八股，也不搞洋八股，虽是小打小闹，却也显示了锐气和活力。出题目的人，躯壳里是老观念，却“规范”不了年轻人的活泼思维。但也不能不看到，它也有落后于时代的负面因素。作为参与者和亲历者，田遨先生对鲍青文社这一组织的评价既全面又客观，值此一记。

【民间记忆】

黄县话里的古汉语

□王东超

有这样一个故事：一位学者去曲阜游览孔府，向路边一位老大娘问路，先客气地打个招呼：“大娘，您吃饭了吗？”大娘回答：“食久矣。”学者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后经本地人点拨，才知道“食久矣”就是“早就吃过了”。他不禁感慨：“曲阜真不愧是圣人故里，连老太太说话都是先秦的古汉语，透着学问呐！”

其实黄县话中也有较多古汉语的遗存，只是人们习焉不察，未加留意。为什么黄县话保留古汉语的成分会比较多呢？历史上，在群雄逐鹿的交通要冲，在人们“张袂成阴、挥汗成雨、比肩接踵”的繁华都市，“城头变幻大王旗”，本地话与官话、各地方言甚至其他民族语言、外国语言都会相互碰撞、影响、渗透，语言的发展变化是很快的。而黄县地处登州海角，古称东夷，是远离中原的边远偏僻之地，相对比较闭塞，跟陶渊明在《桃花源记》里描述的“乃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有些类似。因此，黄县话自然也跟与世隔绝差不多，一辈一辈地就把一些古代的词语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，化为语言的“虫珀”。这里试举几例。

至于今。孔子在《论语·宪问》中说：“管仲相桓公，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赐。”意思是：管仲辅相桓公，称霸诸侯，使天下一切得到匡正，人民到今天还受到他的好处。在黄县话中，现在仍有“到于今”一词，意思是“直到现在”，如：他好吃懒做，到于今也没说上媳妇。

能矣。《管子·戒第二十六》：“任之重者莫如身，涂之畏者莫如口，期而远者莫如年。以重任行畏涂，至远期，唯君子乃能矣。”大致意思是：以天下为己任，可谓重任在肩，是非荣辱皆自口出，故言可畏，世事瞬息万变，以年为期可谓远矣，负重任，行畏途，坚持不懈地去实现目标，只有君子才能做到。明代张居正《赠吴霁翁督学山东序》：“今世学者，含菁咀华，选词吐艳，盖人人能矣。”意思是现今的读书人，欣赏、体味诗文的精华，拣选辞藻写成花团锦簇的文章，大概是人人都能做到的。这两处“能矣”都是能够的意思，黄县话里至今还是这么用，如：“你能听老师的话吗？”“能矣！”

著。战国时辞赋家宋玉在其《登徒子好色赋》中写道：“东家之子，增之一分则太长，减之一分则太短；著粉则太白，施朱则太赤。”意思就是他邻居家的姑娘长得恰到好处，非常合适，再高一分就显得高了，再矮一分就有点矮了。著”是“使附着在别的物体上”“添加”的意思，在黄县话中，“著”的这一义项仍然保留着，如：菜有点淡了，再著点盐。还有一个意思是“盛”、“放”的意思，如：屋里著不下你喽。

气不忿。庚翼是东晋书法家，少时与王羲之齐名。明代张岱《夜航船》中有个“家鸡野鹜”的故事，说的就是他和王羲之之间的事：晋庚翼少时，书与右军齐名，学者多宗右军。庚不忿，与都人书云：“小儿辈乃厌家鸡，反爱野鹜，皆学逸少书。”这段话的意思是：晋人庚翼年轻时，书法与王羲之同样出名，但学书法的人都推崇王羲之。庚翼不服气，在致京都友人的信中说：“后生们不爱家鸡爱野鹜，难怪都学习逸少的书法。”《红楼梦》第五回：“便是那些小丫头们，亦多与宝钗玩笑，因此，黛玉心中便有些不忿。”这两处的“不忿”是心中不平，气不过或是不服气的意思，在黄县话中，仍然保留了这个用法，不过一般说成是“气不忿”，比如：小华有一只漂亮的鸡毛毽，天天在她跟前显摆，她气不忿，找个机会偷偷把毽子藏起来了。

黄县话里保留下来的这些古汉语，如同先人遗落的明珠，历经千年，仍熠熠生辉，把黄县话装点得古雅、厚重而又迷人。那些嫌黄县话太土的人并不知道，或许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，就透着秦风汉韵呢。

【老照片】

我在勘探队的处女作

□高伟

1983年，20岁的我是一名地质勘探工人，正痴迷地爱着文学。那时候正值“文革”结束不久，很多年轻人都像我一样沉溺在文学梦里。我上班的工具包里，除了工装和饭盒，还天天装着一本文学杂志。12月，一首题为《台灯》的小诗被当月《新疆青年》发表，成了我的处女作。

当时的《新疆青年》虽然是一本综合性杂志，每期却拿出四五页的篇幅刊登诗歌，“边塞三诗人”杨牧、周涛、章德益经常在上面刊登诗歌，是我崇拜的偶像。记得章德益先生是诗歌板块的特约编辑，把我那些稚嫩的诗作寄给了他。那时候挤在文学道上的年轻人太多了，据说编辑部每天的来稿都用麻袋装，写得不好也不退稿，直接就扔到麻袋里卖废纸了。我的诗稿没有被当成废纸，它被章先生退了回来，还附了一封信，说了几句鼓励的话，让我倍感鼓舞。后来我就不停地将习作寄给章老师，终于在1983年第12期《新疆青年》发表了我人生中的第一首小诗《台灯》，原诗三十多行，发出来掐头去尾只留了四行：“夜幕中，你像一把伞，撑起浓重的夜晚。在你的绿荫下，我播下希望的种子。”后面还有作者简介，有点“照顾情绪”的意思。

刊登这首诗的样刊和6元钱稿费寄来后，我在“文朋诗友”圈子里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轰动。当时，在我工作的这家国家大型煤炭企业，有一个数百人的“乌金”诗社，每年能在省级报刊发表作品的作者，却不到十人。这四行小诗现在看起来虽然稚嫩可笑，但我非常珍惜，一直保存着这首小诗剪样。



当年作者在勘探队